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当抗议遭遇挫折：集体行动失利情境下情绪反应对行动意愿的作用

作者：殷融 张菲菲 王元元 臧日霞

---

### 第一轮

#### 审稿人 1 意见：

总体上看，本研究是有理论意义的，对与集体行动发生与发展的心理机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研究方法运用也比较恰当，整体水平较高。有几个问题需要作者考虑。

**意见 1：**毫无疑问，集体行动必然涉及多人聚焦在一起的群体，所以群体的规模会严重影响集体行动参与者的情绪反应、利益诉求、行动意愿，甚至对群体的认同感等等。本研究虽然仅涉及集体行动参与者成员的利益诉求，而不涉及更为多元和基本的价值诉求等，但是，无论是以往的研究结果，还是人们的朴素经验，都显示了群体规模在群体互动或集体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集体行动相关变量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应该控制群体的规模变量或者操纵群体规模变量，以考察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这样才能更深入并切实地揭示集体行动的机制。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建议。诚如审稿老师所说，群体规模在群体互动或集体行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之所没有涉及到这一因素，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的考虑。第一，本研究的四个分实验考察的都是某一特定集体行动中行动消极结果对参与者情绪的影响，而不是对不同的集体行动进行比较，由于每一个研究仅涉及单一行动，因此就无法将客观的群体规模作为变量，在研究中进行操作或控制。

第二，群体规模是影响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的前因变量，大量关于群体现象的研究都证实过群体成员的数量会影响到群体成员的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水平，从这一角度看，群体规模与群体认同、群体效能变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参与者对群体规模主观感受的差异可以反映在他们的效能评估水平上，或者说，群体规模可以通过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变量影响集体行动，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在研究中不适宜对群体规模进行控制。

事实上，大量与群体有关的人口学因素如群体人数、社会经济地位、政治权力等都会影响到群体成员的认同与效能评估水平，但本研究侧重的是考察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变量会影响到参与者对行动消极结果的情绪反应，并不计划对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的前因变量也进行探讨。根据审稿老师的建议在修改稿在第 7 大部分“局限与展望”的第一大段涉及到了这一问题，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虑。

**意见 2:** 本研究考察了两个重要变量,即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感对集体行动失利后成员情绪及再行动意愿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对于群体的互动也非常关键。但是,这两个变量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无相互影响,会如何相互影响?可以预见,如果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话,所发生的不同方向的相互影响会直接作用于随后产生的集体行动失利后的成员情绪反应和再行动意愿。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建议。本文之所以没有考虑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虽然大量研究都显示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但认同与效能间的因果作用机制依然存疑,就目前来看,并没有非常明确、一致的实验证据显示认同与效能间存在某种单向影响关系。可以认为,认同与效能互为前因变量,同时二者又存在很多共同的前因变量,如内部凝聚力、群体规模、群体影响力等。正是因为认同与效能之间存在这种关系,本研究实验 2 与实验 3 才分别对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进行操纵与检验,如果在实验中同时操纵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甚至可能出现操纵无效的情况,即对认同的操纵影响了对效能的操纵,反之亦然。另外,如果实验 2 在操纵群体认同的同时,在两个时点(集体行动前、消极结果反馈前)测量群体效能,即便观察到群体效能的变化,此时也无法澄清效能的变化到底是哪一因素所导致的(认同操纵或行动参与本身),实验 3 同样如此。而且由于实验 4 研究结果说明了认同与效能对参与者感知消极结果时的情绪体验具有独立的影响作用,因此,即便在实验中对认同的操纵影响了效能,进而影响了情绪体验,但这与本研究已有的实验结论也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无论群体认同是否会影响群体效能(或相反),但认同与效能对行动失利情境下参与者愤怒与沮丧情绪体验的影响作用是确定的,相比之下,当前的研究和分析方式可以更清晰的呈现研究结论。

当然,如果将关注视角从情绪体验转移到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可能会发现,群体认同、群体效能、结果反馈与行动意愿间存在复杂的作用关系,例如消极结果对群体效能的影响可能会受到群体认同的影响。根据审稿老师的建议,本文在修改稿第 7 部分“局限与展望”第 2 段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意见 3:** 无论是本研究操纵的实验室情境也好,还是利用现实生活发生的自然情境也好,其集体行动的发生都依赖于临时组建的一定规模群体,那么这些由某些利益诉求而临时组建的群体,对于其成员的重要性如何?成员对群体的信赖、对其他成员的信赖、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或亲密感、沟通方式或效果等都会对成员的情绪反应,以及再行动的意愿产生影响。那么对于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也许需要构建一个潜变量加以控制或探讨。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建议。本问题的情况与问题 1 大致类似,如审稿老师所说,成员对群体的信赖、对其他成员的信赖、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或亲密感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成员对触发事件的情绪反应。但这些因素也正是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的前因变量,例如,本研究中群体认同的测量问题就包含了群体成员对与内群体紧密联系程度的感知,而内群体信任、内群体团

结等因素也都会影响到群体效能评估。因此，这些因素对情绪感受的影响可以通过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变量表现出来。如果将这些因素加以控制，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指标也就不再代表真实的群体认同与效能水平。由于本研究侧重的是考察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变量会影响到参与者对行动消极结果的情绪反应，并不计划对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的前因变量也进行探讨，所以没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细致的考察。当然这些因素在集体行动研究中理应受到重视，根据审稿老师的建议在修改稿在第7大部分“局限与展望”的第一大段涉及到了这一问题，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虑。

**意见 4：**本研究着眼点为集体行动失利后成员的情绪反应及再行动的意愿，发现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群体效能感会影响前述两个变量。这个视角虽然很重要，但它是基于成员内在的判断或感受的，其实，这些内在的判断与感受不会是凭空而生的，其可能来自于成员对环境变量（例如制度规则、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态度、处理事态的方式、所处环境的普遍价值观或文化规范等）的认知与评判，也就是说，这些环境变量又对群体认同感及群体效能感有所制约。因此，作者如果拥有行动者与环境交互的视角，也许会有更有意思的发现。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意见。本问题与问题1和问题3类似，本文之所以选择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作为情绪的影响变量，是因为群体认同、群体效能与群体情绪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被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三大变量。被试对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的判定确实很大程度上会受环境变量的影响，由于研究不计划对认同与效能的前因变量也进行探讨，所以在研究中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但根据审稿老师的意见，在文章最后的讨论部分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修改稿修改稿在第7大部分“局限与展望”的第一大段涉及到了这一问题，第三大段也特别涉及到了不同在不同的群体互动情境下，对立群体的处理方式也会影响到群体成员对触发事件的情绪反应。

**意见 5：**建议作者根据本研究结果给出如何引导合理集体行动，避免不合理的集体行动，以及避免集体行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后果的策略。以便提升研究的现实意义。

**回应：**根据审稿老师意见，在第6部分倒数第2段增加了相关内容，指出了本研究结果对公共事业管理的现实指导意义。

---

#### **审稿人 2 意见：**

《当抗议遭遇挫折：集体行动失利情境下情绪反应对行动意愿的作用》一文通过系列实验研究考察了集体行动失利情境下参与者情绪体验对其未来行动意愿的影响，以及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对情绪的作用机制，选题呼应了当前集体行动领域的研究由静态描述向动态探索的发展趋势，文献掌握全面、研究逻辑清晰、行文流畅，现仅提出以下问题供思考：

**意见 1:** 作者旨在对集体行动做动态性研究,但实际上,虽然研究者通过两时点的实验程序,展示了集体行动从开始到受挫的阶段,但对主要变量的测量都是静态的,即一次性测量,特别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变量“愤怒”和“沮丧”情绪,因此,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展示集体行动参与意愿的动态发展过程。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意见,本研究之所以对主要变量都是进行一次性测量,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本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三方面,集体行动失利所引发被试的情绪反应,特定情绪反应对未来行动意愿的预测作用,以及认同与效能变量对情绪感受的影响。针对这三个主要研究目的,可能一次性测量是更为适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即使在第一个研究阶段测量了被试的情绪感受,但此时情绪触发事件(不公正遭遇)与第二次测量时的触发事件(行动失利)是不同的,如果将这两个时间点的情绪体验进行比较,很难说明情绪的变化是不同触发事件还是行动参与本身造成的,如果再考虑群体认同等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作用,整个研究会更加复杂。而且沮丧情绪是基于行动遭遇挫折而产生的,在第一个研究阶段测量被试这一情绪感受并不合适。

第二,由于本研究想要验证的问题是,在集体行动遭遇失利背景下,参与者特定的情绪体验会对他们未来的行动产生影响,所以一次测量就可以达到研究的预期目的。之所以使用两点时的实验程序,主要目的是对“集体行动遭遇挫折”这一事件进行操纵与模拟,而不是要探讨参与者参与意愿及情绪等心理因素的动态变化(尽管实验 4 对行动意愿进行了 2 次测量,但这种设定的主要目的是说明群体认同与效能对行动意愿影响机制的相对稳定性,同时避免饱和模型)。包括在本研究实验 2 与实验 3 中,研究者在消极结果反馈前对被试的群体认同或群体效能水平进行实验操纵及一次性测量,这样可以更好的排除无关变量的影响,更为直接的说明认同或效能变量如何影响参与者对消极结果的情绪感受,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更为相适。

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才采用了当前的研究模式。实际上,所谓“集体行动的动态性研究”,主要是有别于过去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只关注集体行动准备阶段的研究取向,按照本文作者的理解,考察集体行动发展特定阶段(如本研究以行动失利为背景)参与者各种心理及行为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也属于这一研究取向。诚如审稿老师所说,通过多阶段多次测量,探讨抗议者情绪、认同、效能等心理因素及行动意愿随群际互动发生的变化,可以更好的展示集体行动的动态演变性,这也正是本研究团队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在最后展望这一部分第 2 段其实也谈论到了这一问题。但针对本文研究主题,当前的研究方法可以支撑研究设想。

**意见 2:** 就实验 2~3 现有的数据看,如果能综合分析群体认同或群体效能对情绪(“愤怒”和“沮丧”)与再次参与意愿关系的影响,结果可能更有理论价值,现在仅分析了两两变量间的相关。而研究 4 虽然综合考虑变量间关系,但从模型上看,关注的是情绪在群体认同和群体

效能对再次参与意愿的影响的中介作用，实际上，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还可能调节情绪（“愤怒”和“沮丧”）与再次参与意愿的关系。希望能补充这部分的分析结果。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意见，根据修改意见，在实验 2 和实验 3 分析了群体认同（效能）以情绪为中介对行动意愿的影响。至于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对情绪与行动意愿间作用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其实最初考虑了这一问题，由于现有的文献并没有说明这种可能性，且本研究分析结果也显示确实不存在这种调节效应，就没有在正文中展示这一部分的分析。为了避免引起阅读者的猜疑或误解，修改稿补充了这部分分析结果。另外，在实验 2 和实验 3 的结果分析部分分别增加了关于群体认同（效能）对愤怒（沮丧）情绪——行动意愿间作用调节效应的分析，之所以将这种分析补充在实验 2 与实验 3，是因为实验 2 与实验 3 是分别对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进行实验操纵，因而结果更有说服力。

**意见 3：**研究 4 结果显示，“群体认同及群体效能对之后的行动意愿不存在直接的预测作用”，作者从群体认同及群体效能的相对稳定性角度做出解释。但实际上，该结果可能仅能说明集体行动初始的群体认同及群体效能不能直接预测集体行动受挫后的再次行动意愿。集体行动受挫可能影响群体认同，特别是群体效能，进而影响再次参与意愿，因此，研究 4 有必要在第二次测量时也测量群体认同和效能，此时，可能就出现了群体认同和效能对再次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意见。实际上实验 4 并没有否认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对被试再次参与集体行动意愿的作用，在实验 4 的模型中，如果将“行动意愿 T1”这一变量去掉，增加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对“行动意愿 T2”的作用路径，就可以显示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受挫后被试的行动意愿依然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但此时假设模型会成为饱和模型，不利于结果的呈现，实验 4 在进行研究构想时，正是考虑到这一问题，才增加了“行动意愿 T1”这一变量，通过该变量，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对再次行动意愿的影响可以以该变量为中介而实现。

本研究在最初构想时，其实曾经考虑过对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进行二次测量，这样可以展现是否行动受挫会对认同与效能产生影响。但这样一来，研究结果的便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受挫后情绪体验、最初认同（效能）水平、受挫后认同（效能）水平与行动意愿间的关系会极为复杂，无法澄清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例如，结果可能是结果反馈影响了情绪，情绪受到最初认同与效能的影响，继而对认同与效能产生了反向影响。而且根据集体行动的“灌能”效应研究，参与行动本身也会影响认同与效能评估，此时认同与效能的变化会受多个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是缠绕在一起无法分离出来的。正是为了避免太过复杂的变量关系，本研究实验 2 与实验 3 才对认同与效能变量进行实验操纵，以直接说明认同与效能对参与者感知消极结果时情绪体验的影响。而实验 4 只是在另外的背景下、通过调查的方式对实验 2 与实验 3 的结果见再次验证。

事实上，由于集体行动涉及的影响因素太多，而各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也较为复杂，因此很难在单一研究中对所有可能涉及的影响因素与作用关系都进行讨论。诚如审稿老师所说“集体行动受挫可能影响群体认同，特别是群体效能，进而影响再次参与意愿”，但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情绪，以及认同与效能对情绪体验的影响，认同与效能是否会因触发事件发生改变并不在本研究讨论范围之内。由于本研究实验 2 与实验 3 通过实验操作的方式证明了认同与效能对情绪体验的影响，因此即便认同与效能会因消极结果发生变化，与本研究的基本结论也并不相悖。当然，审稿老师提出的这一问题也很重要，根据这一审稿意见，本文在最后的第 7 部分展望部分的第二段增加了对这一问题可探讨。

**意见 4:** 另外，研究 4 中设定的集体行动的目标是：只是将 J 学院的新生搬到分校区，而高年级学生则留在校本部，因此该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者是 J 学院学生高年级学生而非所有 J 学院学生。这就涉及到将认同的群体设定为“J 学院学生”，如询问“J 学院学生这个身份对我很重要”，是否恰当的问题。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发现的问题。这问题是作者表述不当所引起的，在本研究中，“高年级”学生其实指的就是 J 学院已入学的全部学生，而“新生”并不是指低年级学生，是还未入学的下一学年的学生。因此，在进行实验时，集体行动的获益者就是 J 学院的全部已有学生，或者说，每一个被试或参与者都会从众受益，因此，将群体认同设定为“J 学院学生”是符合实验目的的，此时这一指标可以反映被试与 J 学院其他学生间的心理距离及学生内部的凝聚力。在修改稿中，作者对此部分不当表述进行了修改，避免引发阅读者的误解。

---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尽管每一个研究仅涉及单一行动，也不是要对不同的集体行动进行比较，但每一种集体行动都与其群体的规模相关，特别是其行动遭受失败打击之后的再行动时。如果不考虑规模的话，可以说是忽略了主要的关键变量。这个意见并不要求你对不同的集体行动做比较。群体规模可以被认为是影响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的前因变量，但是规模不会仅仅影响群体认同及群体效能感，它其实对本研究探讨的群体行动、群体情绪、群体行动意愿等都可能直接的影响。因而，简单地将群体规模作为群体认同及群体效能的前因变量是不妥的。

每一项研究当然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和关键变量，但是应该认知全面地考虑有可能对因变量造成影响的相关变量，而针对本研究，群体规模就是这样的变量。

原先所提第三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并不一样或类似。要澄清这个问题，其实需要依赖对第一个问题的澄清。在澄清了第一个问题之后，也许可以说这些诸多因素可能是群体认同及群体效能的前因变量；而在未澄清第一个问题之前，无法这么确认。

**回应:** 感谢审稿老师的意见。本论文之所以没有涉及群体规模这一变量，主要是出于以下原

因:

第一,在目前已有的国内外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极少见到涉及群体规模这一变量的研究,仅就本文所引用的文献来看确实没有先例,即便是涉及集体行动动态演变的研究,也未见有研究者对此变量进行控制(如以下所罗列的近年来的重要相关研究,其中部分文章引用率超过 100),因此,本研究在实施设计时忽视了这一问题。

Drury, J., Cocking, C., Beale, J., Hanson, C., & Rapley, F. (2005). The phenomenology of empowerment in collective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 309-328.

Blackwood, L. M., & Louis, W. R. (2012). If it matters for the group then it matters to me: Collective action outcomes for seasoned activis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72-92.

Becker, J. C., Tausch, N., Spears, R., & Christ, O. (2011). Committed Dis(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adical Collective Action Fosters Disidentification With the Broader In-Group But Enhance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8), 1104-1116.

Becker, J. C., Tausch, N., Spears, R., & Christ, O. (2011). Committed Dis(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adical Collective Action Fosters Disidentification With the Broader In-Group But Enhance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8), 1104-1116.

Foster, M. D. (2015). Tweeting about sexism: The well-being benefits of a social media collective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Tausch, N., Becker, J., Spears, R., Christ, O., Saab, R., Singh, P., et al. (2011). Explaining radical group behavior: Developing emotion and efficacy routes to normative and 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1*(101), 129-148.

Tausch, N., & Becker, J. C. (2013). Emotional reaction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action intention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udent protests in German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2*(3), 525-542.

Thomas, E. F., & Louis, W. R. (2014). When Will Collective Action Be Effective? Violent and Non-Violent Protests Differentially Influence Perceptions of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Among Sympathiz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0*(2), 263 - 276.

Kahn, D. T., Liberman, V., Halperin, E., & Ross, L. (2016). Intergroup Sentiment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Responses to Potentially Ameliorative Proposals in the Context of an Intractable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3), 353-355.

Shuman, E., Cohen-Chen, S., Hirsch-Hoefler, S., & Halperin, E. (2016). Explaining Normative Versus Nonnormative Action: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8*(2), 379-388.

Saab, R., Spears, R., Tausch, N., & Sasse, J. (2016). Predicting Aggressive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Efficacy of Peaceful and Aggressive Ac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press.

第二,本研究虽然没有涉及群体规模变量,但四个实验中所涉及的群体在规模上具有相

似性，被试群体都是基于日常生活身份而组成的大群体（社区居民、学生会成员、学院学生），而不是临时组建的群体，这几类身份也是集体行动研究中常常涉及的身份类别。实际上，在当前的集体行动研究领域，研究者都是基于规模较大的群体（如学校学生、行业员工、社区居民、协会会员）设计开展研究，而不是人数较少的小群体（如班级小组），这可能也正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没有对群体规模变量进行控制的原因。

第三，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群体效能、群体认同和群体情绪被公认为解释集体行动的三大前因变量，目前已有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都是围绕这三大变量在进行研究。而在关于群体情绪动态性演变的研究中，已有的研究也只考虑了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变量的影响（如下图示例），因此本研究在设计之初，也主要只考虑了认同与效能对情绪的影响（从实际数据结果中的解释系数及相关系数来看，三大变量对行动意愿确实已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不同以往研究的是，本研究使用实验操纵的方式对结果反馈进行了处理，同时考虑了与消极结果有关的沮丧变量，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但在前因变量的设定方面，确实如审稿老师所建议的，存在考虑不周之处。

**Table 1.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Study 1**

	Collective action condition		Control condition	
Outgroup-directed anger	4.08	(1.32)	2.66	(1.44)
Self-directed positive affect	3.64	(1.13)	3.01	(1.36)
Group efficacy	4.10	(1.15)	3.94	(1.13)
Identification with students	4.55	(1.04)	3.66	(1.20)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rotest movement	3.20	(1.62)	2.43	(1.21)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s	3.53	(1.37)	2.89	(1.21)

上图为“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Differentiating Self-Directed and Outgroup-Directed Emotions”一文变量数据表，该文发表于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该研究考察了参与集体行动对参与者愤怒及积极情绪的影响，考虑了群体效能与群体认同对情绪变化的影响。

*Emotional reaction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9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zero-order correlations among key variables**

	M	SD	1	2	3	4	5	6	7
1. Protest movement identification	3.75	1.70	-	.45***	.72***	.45***	.55***	.50***	.54***
2. Group efficacy (T1)	4.40	1.39		-	.44**	.32**	.48***	.51***	.44***
3. Action tendencies (T1)	4.38	1.70			-	.40***	.43***	.49***	.64**
4. Pride (about abolishment)	3.82	2.01				-	.55***	.43***	.47***
5. Anger (about complaint rejection)	4.50	1.85					-	.40***	.57***
6. Group efficacy (T2)	4.49	1.42						-	.57***
7. Action tendencies (T2)	3.78	1.78							-

上图为“Emotional reaction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action intention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udent protests in Germany”一文



变量数据表，该文发表于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该研究考察了集体行动结果对参与者自豪与愤怒感的影响，情绪感受的主要的前因变量也是考虑了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

第四，诚如审稿老师所说，每一种集体行动都与其群体的规模相关，在集体行动的动态演变中，群体规模可能是影响行动演变的关键变量，而群体内部的互动模式、亲密程度也会对群体情绪及行动倾向的演变产生影响，这是本研究所忽视的部分，非常感谢审稿老师提出的这一宝贵意见，研究团队会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与分析，并在日后的研究中专门针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但具体到本文，由于本研究实验 1 与实验 4 都是在真实社会情境下所进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效性，因此确实无法重新组织研究（实际上这正是集体行动研究的最困难之处，为了追求研究效度，往往需要等待或寻找真实的触发事件），如果进行重新实验反而会丧失研究情境的真实性。鉴于此，本文在最后讨论部分第一大段增加了新的内容，专门针对忽视了群体规模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分析群体规模可能对效能、情绪、认同及行动产生的影响。

**意见 2：**原先所提第四个问题也不与第一和第三个问题类似。这个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客观情境变量，即集体行动者对自己所处情境的认知与判断。作者可以说本研究只考虑认同与效能对与集体行动意愿和集体情绪的作用，但却不能排除这些情境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因而，不考虑情境变量是不足的。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意见，如建议所言，群体成员对客观情境的认知与评判（例如制度规则、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态度、处理事态的方式）会对未来行动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本研究中，四个实验在情境上具有某些相似性：四个实验所涉及的集体行动都属于低威胁冲突情境，参与者面对的最糟糕结果也只是目标无法达成，但不会遭受对立群体的报复、惩罚或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动失败，参与者付出的代价也较低，因此他们对对立群体管制策略的感知可能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另外，本研究选择的都是较为温和的、符合社会规则的集体行动策略，而没有选择违背社会规则的行动策略，因而不涉及到集体行动与社会规则的关系。实际上，在整个集体行动研究领域，涉及参与者对外群体进行预估判断的研究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文献并不太多，且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外群体感知对群体效能或集体行动策略的影响，例如：

Cohen-Chen 等人 (2014)的“Beliefs About the Malleability of Immoral Groups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一文考察了以色列被试关于政客可改变性的信念以群体效能感为中介影响集体行动的效应。Glasford 和 Pratto (2014) 的“*When extraordinary injustice leads to ordinary response: How perpetrator power and size of an injustice event affect bystander efficacy and collective action*”一文考察了被试的效能评估是否会受到被抗议对象权力水平的影响。

Shuman 等人 (2016)的“Explaining Normative Versus Nonnormative Action: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探讨了参与者关于政府政策的预测与他们对暴力行动支持间的关系。

与这些研究相比，本文则更关注集体行动的动态演变性（上述研究考察的是集体行动的初始阶段），主要考虑的是行动发展过程中消极结果反馈对情绪的影响，以及不同情绪对未来行动意愿的影响，侧重有所不同。正因如此，本研究在设计时没有对更多的情境变量进行考察，这确实是本文考虑不周及研究局限之处，根据审稿老师的意见，作者在最后讨论部分针对这一问题专门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在修改稿中较好地回应了一审中提到的问题，稿件质量进一步提高。